

福利支出、经济结构与政府债务规模 ——基于欧盟的实证研究

戴卫东¹, 孔庆洋²

(1. 浙江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2.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通过对欧盟债务危机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对各国影响的实证研究, 可以为欧盟债务后危机时代的社会治理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研究发现, 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是欧元区政府债务危机的重要推手, 税收、总储蓄、国内投资以及净出口对不同经济结构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机制不同。对于债务危机国家而言, 单一地削减福利支出、增加净出口、扩大国内投资和增加税收都不是化解危机的有效策略, 最根本的途径是对欧盟的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等进行调整和改革。这些经验与教训对于我国推行经济发展“新常态”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欧盟债务危机; 福利支出; 经济结构; 政府债务规模

中图分类号: F8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892 (2015) 11-0033-09

DOI:10.13676/j.cnki.cn36-1030/f.2015.11.004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2008年10月美国华尔街金融爆发“风暴”, 北欧的冰岛继而中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先后爆发。但由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小, 再加上国际救助及时, 未酿成较大的全球性金融动荡。2009年12月, 希腊的主权债务问题凸显。2010年3月进一步发酵, 开始向“欧洲5国”(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蔓延。2011年底, 这5个国家政府全部更迭, 进而恶化到整个欧元区17国, 拖累了欧盟27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时至今日, 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欧盟各国政府和金融界仍没有停止开展“营救性”的讨论和计划。

关于欧债危机的根源, 国内外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财政经济结构问题导致经济发展乏力。如张明等(2012)认为, 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直接引爆了欧债危机。^[1]刘新华(2012)认为欧元区国家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 直接导致欧元区危机国家脆弱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高失业率, 以及巨额的贸易赤字现状。^[2]张晓晶和李成(2010)、Wallison和Calomiris(2008)都认为, 欧洲银行业的信贷扩张事实上很疯狂, 致使其经营风险急剧增加。^[3-4]陈

收稿日期: 2015-07-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4BSH126);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OECD国家长期护理保险: 政策环境、福利运行与评价借鉴”(13YJA840001)

作者简介: 戴卫东,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 联系方式 dwd68@163.com; 孔庆洋,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

志昂等 (2011)、Grauwe (2012) 认为, 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导致的经常账户赤字促成了债务累积, 而政府信用丧失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5-6]二是高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不堪重负, 政府预算持续赤字。如施魏因贝格尔 (2012) 认为, 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 PIIGS 国家 (“欧猪国家”) 在享受超出自身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上走得太远, 导致其政府的持续预算赤字。^[7]郑秉文 (2011)、李旭章和龙小燕 (2012) 都认为, 从深层看, 过度的福利和慷慨的保障已使福利国家不堪重负,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更使隐性财务日益显现, 债务货币化正使福利国家亦步亦趋, 走向债务国家。^[8-9]以主权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希腊为例展开的研究表明, 是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问题影响了福利开支的正常增长, 而非相反 (鲁全, 2012)。^[10]

此外, Nikolaos (2013) 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更多的是政治问题, 而非经济问题。^[11]王汉儒 (2012) 也认为, 欧美国家 “民主超载” 的政治体制表现为美国主导的当前 “美元为主, 欧元为辅” 的非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两种传导机制, 放大了欧洲经济结构性问题, 最终造成了欧债危机。^[12]霍夫曼等 (2013) 从欧盟管理机制入手进行分析, 认为欧盟委员会在成立之初由于各方政治结构导致其基本机制并不完善, 没有设立统一的财政、经济联合管理机构, 各国之间也缺乏经济协调机制, 因此, 不健全的机制终于导致了这样严重的后果。^[13]

欧债危机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的? 相关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实证研究不是很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本文拟作深入、全面的研究。基于欧债危机的已有理论研究, 本文从净出口、总储蓄、税收、国内投资、公共支出以及社会福利支出等重要因素出发, 用这六个因素作为自变量, 政府债务为因变量, 建立统计模型。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找出欧债危机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对各国的影响, 为欧盟后危机时代的国家治理和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二、变量选择的理论与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一) 变量选择的理论

传统经济理论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本国国民的消费需求支出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 政府投资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包括发行国债等, 对教育、科技等的支出, 是辅助性的扩大内需。净出口是一个国家出口产品和服务价值与进口产品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当净出口为正值, 即在贸易顺差时 (出口产品和服务价值大于进口产品和服务价值), 能够为一国创收外汇, 带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税收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与税收形成良性互动的情况下, 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则 GDP 总量就越高, 这样税收就越多。同时, 来源于税收的国家财政收入投资于卫生和教育事业, 又会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 因而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 道理亦很明显。可见, 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以及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因此, 如果国内投资超出国内实际需求, 那么就会形成泡沫经济。如果税收负担过重, 则会影响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和国民消费能力。可见, 这两种情形都会阻碍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公共支出是指为政府提供公共品而对货物和服务的运营活动的现金支付。它包括劳动者薪酬 (如工资和薪金)、利息与补贴、赠予、社会福利及租金和红利等其他支出。显然, 社会福利支出是公共支出的一部分。所谓社会福利支出, 是指政府为改善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保证他们在文化和教育、医疗和健康、就业和住宅, 以及养老等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而提供的财政投入。一般而言, 公共财政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则社会福利的支出水平就会相应地提高。政府债务是指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或向外国政府和银行借

款所形成的财政负担。在通常情形下，政府债务与公共支出、社会福利支出、总储蓄呈正相关关系，与净出口呈负相关关系，但与国内投资、税收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二)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通过世界银行网站，查阅了 2001-2010 年十年间欧盟 27 国的净出口、税收、国内投资、公共支出、社会福利支出以及政府债务 等因素占 GDP 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其中，净出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为各国历年的出口产品和服务总值占 GDP 的百分比与进口产品和服务总值占 GDP 的百分比的差所得。另外，消费占 GDP 的百分比用总储蓄占 GDP 的百分比来替代，是因为宏观上国民总储蓄越多，则消费水平就越低；反之，亦然。

1. “欧洲 5 国”债务危机影响因素分析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首发于“欧洲 5 国”，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首先分析自 2001-2010 年以来影响“欧洲 5 国”债务危机的经济社会相关因素。

从图 1 来看，2008 年以后，“欧洲 5 国”社会福利支出占 GDP 比重从高到低依次是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以及西班牙。而在此前，意大利的这一比重高于希腊，西班牙的比重高于爱尔兰。图 2 显示，十年期间“欧洲 5 国”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从高到低依次是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基本持平）、爱尔兰、西班牙，而爱尔兰在 2007 年后则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增幅显著地超过其他 4 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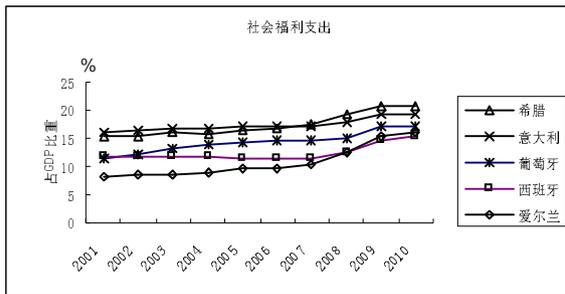


图 1 5 国社会福利支出占 GDP 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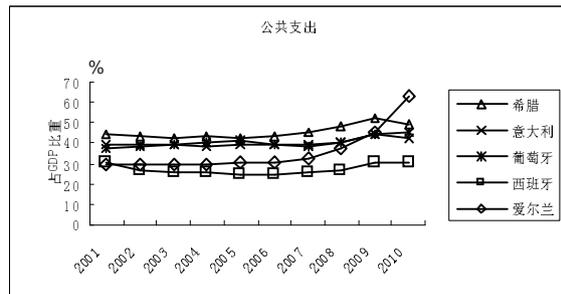


图 2 5 国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

图 3 表明，5 国净出口只有爱尔兰出口产值大于进口产值，意大利在十年间进出口产值基本持平，而西班牙、葡萄牙、希腊 3 国则为负值，且希腊进口总产值远远大于出口总产值。就总储蓄而言，如图 4 所示，进入 21 世纪以后，5 国的总储蓄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 2001 年到 2010 年降幅达到 10 个百分点的国家有爱尔兰和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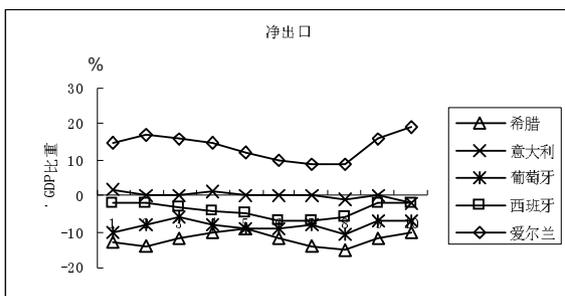


图 3 5 国净出口占 GDP 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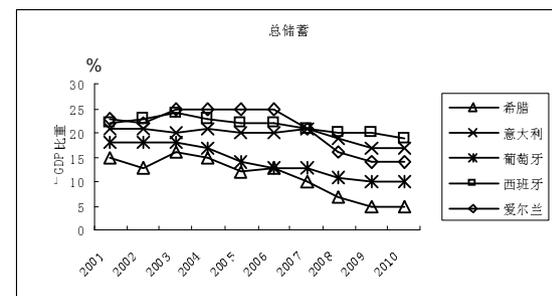


图 4 5 国总储蓄占 GDP 比重

在图 5 中，2001-2010 年，除了西班牙税收占 GDP 比重在 9%~16%徘徊之外，其他 4 国基本上都处于 20%~25%。对于国内投资项，如图 6 所示，5 国在 2008 年之后都呈显著的下降态势，其间或

这里仅指中央政府债务，不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世界银行网站没有提供地方政府债务的相关数据。

升或降变化较大的是爱尔兰和希腊，最高点与最低点之差，爱尔兰达16个百分点，希腊为9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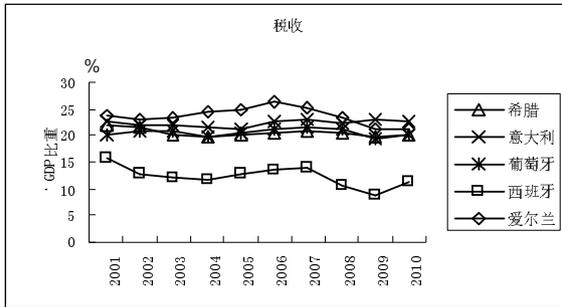


图5 5国税收占GDP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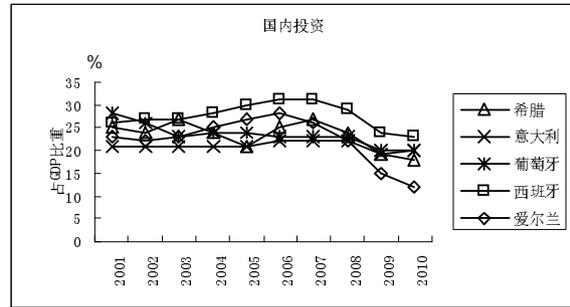


图6 5国国内投资占GDP比重

图7显示，2001-2010年5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都在30%以上，而希腊和意大利的这一比重都在100%~150%，尤以希腊的债务比重最高。

2. “欧洲5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债务危机影响因素比较

上文对“欧洲5国”内部债务危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下面将对“欧洲5国”与欧元区其他12国，以及欧元区17国与“欧盟非欧元区10国”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横向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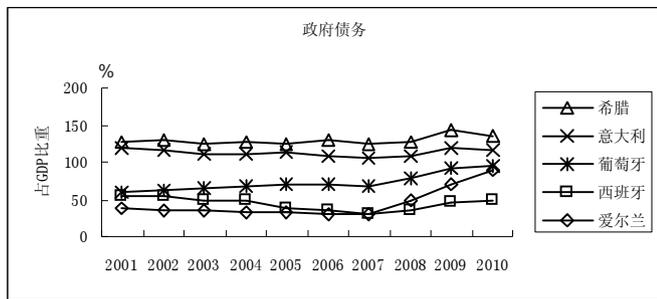


图7 5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

表1数据显示，“欧洲5国”的政府债务大大高于欧元区12国约17个百分点。然而，依据理论，与政府债务呈正相关的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以及总储蓄占GDP的百分比，欧元区12国却超过了“欧洲5国”。显然，较低的税收、长期的贸易逆差和低储蓄导致“欧洲5国”的债务率高企。

表1 2001-2010“欧洲5国”与欧元区12国相关因素比较（均值）

	社会福利支出 (%)	公共支出 (%)	净出口 (%)	总储蓄 (%)	税收 (%)	国内投资 (%)	政府债务 (%)
“欧洲5国”	14.45	37.77	-2.12	17.52	19.89	23.54	74.63
欧元区12国	14.70	40.53	3.24	21.47	22.26	21.88	57.62

由表2可见，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平均值高于欧盟非欧元区10国近20个百分点，说明欧洲债务危机波及较严重的是欧元区17国。较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共支出使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高于欧盟非欧元区10国，欧元区17国较高的公共投资替代了部分国内投资。

表2 2001-2010欧元区17国与欧盟非欧元区10国相关因素比较（均值）

	社会福利支出 (%)	公共支出 (%)	净出口 (%)	总储蓄 (%)	税收 (%)	国内投资 (%)	政府债务 (%)
欧元区17国	14.47	39.70	1.66	20.30	21.55	22.37	62.65
欧盟非欧元区10国	12.98	34.60	-3.15	19.63	19.97	23.14	42.68

欧元区其他12国是指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加上“欧洲5国”为欧元区17国。

欧盟非欧元区10国，即保加利亚、捷克、丹麦、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瑞典、英国。加上欧元区17国为欧盟27国。

总结表 1 和表 2，描述性统计表明了各国净出口、总储蓄、税收、国内投资、公共支出以及社会福利支出的走势以及各国之间的差异。下面将开展欧盟政府债务危机的六个影响因素的程度研究。

三、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为考察欧债危机的影响因素，以政府债务 (GD) 作为响应变量，以社会福利支出 (WE)、公共支出 (PE)、净出口 (NE)、总储蓄 (TS)、税收 (TR) 以及国内投资 (DI) 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如式 (1) 的面板数据模型。其中， β 为待估参数， μ 为误差项。在式 (1) 中， i 为观测国家， t 为观测时间。对于面板数据模型，不仅可以控制随时间不变的不可观测因素，而且还能降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的影响。由于个别国家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家政府债务数据缺失，因此，模型的样本期为 2007-2010 年。鉴于样本期明显小于国家个数，变量的截面特征明显，不存在平稳性问题，无需单位根检验。

$$GD_{it} = \beta_0 + \beta_1 WE_{it} + \beta_2 PE_{it} + \beta_3 NE_{it} + \beta_4 TS_{it} + \beta_5 TR_{it} + \beta_6 DI_{it} + \mu_{it} \quad (1)$$

按经济学理论，一国可以通过提高税收的方法降低政府债务，即税收与债务负相关。但在危机深重的欧元区国家，税率可能较高。此时，若提高税率，则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反而会增加政府债务规模。所以，债务率与税收负相关意味着变量之间存在着内生性。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应用系统 GMM 估计方法，利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通过了 Sarganp 内生性检验。Hausman 检验的 $\chi^2=29.65$ ，在 1% 的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模型，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 中模型 1 所示。

表 3 政府债务危机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结果

	模型 1 欧元区 17 国	模型 2 非欧元区 10 国	模型 3 欧洲 5 国	模型 4 欧元区 12 国
C	-11.34 (36.55)	-64.35*** (15.40)	-202.7*** (24.89)	-73.68** (32.93)
社会福利支出	2.947*** (0.7265)	1.040 (0.5507)	12.32*** (0.6865)	1.383** (0.6354)
公共支出	0.9140* (0.5376)	2.701*** (0.2966)	0.9137*** (0.2134)	2.937*** (0.2594)
净出口	-3.207*** (0.2615)	2.102** (0.8177)	0.6733** (0.2959)	-1.088*** (0.2737)
总储蓄	1.192** (0.480)	-1.104* (0.6229)	-0.7057** (0.3440)	0.7896* (0.4266)
税收	1.984*** (0.6259)	0.3138* (0.2761)	1.047*** (0.2334)	-0.7019* (0.3740)
国内投资	-2.984*** (0.6107)	1.1405** (0.5148)	2.696*** (0.7500)	-1.7653** (0.5737)
R ²	0.903432	0.99036	0.974	0.8653
F	27.79***	240.7	183.63	28.31
D-W 值	2.226	2.133	2.221	2.207
样本	64 2007-2010 年	36 2005-2010 年	50 2001-2010 年	65 2005-2010 年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 1 的常规统计指标如 R²、修正 R²、F 值都说明该模型整体显著，D-W 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从参数估计结果来看，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净出口、税收、国内投资以及总储蓄 6 个因素对政府债务具有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为检验稳健性，本文应用因变量、自变量的增长率指标估计模型 (1)，其他类型国家也类似地建立估计模型。

第一, 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及税收总量是欧元区政府债务高企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估计结果表明: (1) 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与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务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公共财政支出是债务积累的推动力。(2) 税收总量的参数值为正值且在统计上显著, 意味着税收与债务同步增长。如前所述, 这种相关不能理解为税收增长增加了债务负担, 很有可能是为偿付债务利息而提高税收。如表 2 所示, 欧元区的税收总量和政府债务明显高于欧盟非欧元区。

第二, 与税收问题类似, 总储蓄的参数估计值为正且显著。总储蓄是政府降低债务的资金来源, 只有提高储蓄, 债务规模才能维持。如表 2 所示, 欧元区的总储蓄和政府债务明显高于欧盟非欧元区, 较高的储蓄具有被动性, 这与税收相类似。

第三, 净出口与国内投资有助于降低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务。参数值为负值, 说明净出口、国内投资两个解释变量与响应变量政府债务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即如果净出口比率以及国内投资比率越低, 则政府债务率就越高。净出口和国内投资是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 有助于增加政府收入, 可以有效缓解政府债务负担。

四、欧盟国家政府债务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性分析

(一) 欧元区与欧盟非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以欧盟非欧元区 10 国为样本重新估计回归模型 (1), 得模型 2, 其回归结果见表 3。模型 2 的修正 R^2 值、F 值均表明模型整体显著; 模型的 D-W 值为 2.133, 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Hausman 检验和 Sarganp 内生性检验结果与模型 1 类似。据此,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 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对政府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盟非欧元区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变量参数的估计值为正, 表明公共财政支出与政府债务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在统计上显著, 与欧元区国家类似。不同之处在于, 欧盟非欧元区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压力小, 而公共支出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大。

2. 净出口、总储蓄和国内投资对债务规模的影响。欧盟非欧元区国家净出口和国内投资的参数符号为正, 总储蓄的参数符号为负。与欧元区国家相反, 税收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根据表 2, 非欧元区国家净出口为逆差 -3.15%, 而欧元区国家为顺差 1.66%, 可以说是非欧元区国家为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务提供了资金。欧盟非欧元区国家的国内投资率高于欧元区国家, 参数估计值为正, 说明较高的投资率推高了政府债务。欧盟非欧元区的税收负担率低于欧元区, 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 “欧洲 5 国”与欧元区 12 国政府债务危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以欧元区的“欧洲 5 国”和欧元区其他 12 国为样本重新估计回归模型 (1), 得模型 3 和模型 4。模型 3 的修正 R^2 值、F 值均表明模型整体显著; 模型 4 的 D-W 值为 2.207, 模型不存在自相关。Hausman 检验和 Sarganp 内生性检验结果与模型 1 类似。由此, 可以得出如下的几点认识:

1. 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对政府债务危机的影响

“欧洲 5 国”与欧元区其他 12 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变量参数估计值为正, 表明公共财政支出与政府债务规模在统计上显著正相关。“欧洲 5 国”社会福利支出参数估计值远大于欧元区其他 12 国, 说明社会福利支出对“欧洲 5 国”的影响远大于其他的 12 国。那么, 对于政府债务高企的“欧洲 5 国”而言, 控制社会福利支出对缓解政府债务危机至关重要。公共支出对欧元区其他 12 国政府债务的影响大于“欧洲 5 国”, 所以, 控制公共支出是欧元区其他 12 国避免发生类似“欧洲 5 国”债务危机的有效方式。

2. 净出口、总储蓄、国内投资和税收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

根据模型 3,“欧洲 5 国”的净出口、税收和国内投资等三个变量与政府债务规模在统计上显著正相关,总储蓄与政府债务规模在统计上显著负相关;欧元区其他 12 国相关变量对政府债务的影响与“欧洲 5 国”截然不同,即净出口、税收和国内投资与政府债务规模负相关,而总储蓄与政府债务规模正相关,且只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与欧元区其他 12 国相比,“欧洲 5 国”的总储蓄较低,提高总储蓄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务率。“欧洲 5 国”的国内投资率比欧元区其他 12 国高近 2 个百分点,由于债务率较高,资金来源匮乏,增加国内投资虽然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短期投资融资会推高政府债务规模。“欧洲 5 国”的净出口比率为负,但与政府债务规模正相关,提高净出口反而不利于降低债务率。“欧洲 5 国”的净出口与政府债务规模正相关不是特例,根据模型 2,欧盟非欧元区 10 国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根据表 1 和表 2,“欧洲 5 国”和欧盟非欧元区 10 国的净出口都为逆差,且净出口都与政府债务规模正相关。净出口体现出一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反映了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欧洲 5 国”和欧盟非欧元区 10 国的产品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都不具备优势,经济增长乏力。在此背景下,片面地追求贸易平衡可能会浪费更多的资源,增加政府负担,诱发财政危机。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意义

(一) 主要结论

通过对欧盟 27 国政府债务危机的描述性统计,以及政府债务危机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性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净出口、总储蓄、税收、国内投资四个因素对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的影响偏离了常规经济学理论。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结论:

1. 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是欧洲政府债务危机的重要推手。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与政府债务规模呈正相关关系。除了欧盟非欧元区 10 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影响不显著之外,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共支出这两个自变量对欧元区 17 国的政府债务的因变量都有较大的正向影响。

2. 实证研究表明,增加净出口并不一定能缓解政府债务危机。在欧盟 27 国内,欧元区 17 国整体以及欧元区其他 12 国的净出口增加能降低政府债务规模,但是,欧盟非欧元区 10 国和“欧洲 5 国”却相反,原因如上文所述。

3. 总储蓄越高,政府债务也不一定增加;反之,一国政府债务高企,其国民储蓄率有可能较低。在欧盟非欧元区 10 国和“欧洲 5 国”,总储蓄与政府债务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这些国家国民习惯享受高福利,缺乏储蓄的动机。

4. 税收与政府债务的关系,在欧盟非欧元区 10 国以及欧元区 17 国整体、“欧洲 5 国”均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高税收只选择为了高福利,岂有不导致“国穷民情”之理!而在欧元区其他 12 国则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提高税收不但无助于降低国家的债务规模,反而由于降低了经济增长潜力而提高了政府债务率。

5. 国内投资与欧盟非欧元区 10 国、“欧洲 5 国”的政府债务为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这些国家的投资耗费了资源,使得债务高企。而在欧元区其他 12 国,则表现为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居高不下源于国内投资不足,缺乏财富创造能力。

(二) 启示意义

1.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在近期内,要保持我国政府债务总量不上升或适度下降是很难通过提高净出口率来解决的。改变出口创汇的途径有两条:第一,拉动内需,刺激消费(降低居民储

蓄总量),适当降低存款利率和出台贷款的优惠政策。第二,以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四化”同步发展为契机,振兴实体经济,积极开拓新的商品出口市场。特别是要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积极拓展对我国产品需求量较大的“新经济体”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如“金砖五国”和非洲友好的国家。

2. 增加国内投资,做大“蛋糕”。加大国内投资的支持力度,但是,要保证科学发展的冷静头脑,形成合理配置资源的宏观决策机制。否则,一方面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巨大,也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如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另一方面,可能会产生“泡沫经济”(如房地产行业)。这两种情况对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都会带来很大的潜在危害,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之“买单”而负债累累。

3. 税收是一把“双刃剑”。合理的税收政策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反之,就会产生经济学的“漏桶效应”。无论是企业生产税,还是国民收入所得税都是如此。因此,首先要科学地制定税率。如适当降低我国社会保险费(税)的征缴率,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其次,要关注公共财政资金的科学使用问题。公共财政资金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我们应建立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欧债危机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4. 妥善地处理好净出口、国内投资和税收形成的财富创造,国民储蓄总量的财富积累以及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支出形成的财富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这些因素对降低政府债务率的积极作用,尽力避免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如果只顾发展经济,而全体国民分享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那就失去了发展的目标。如果一味地强调提高国民待遇,在国民经济实力难以支撑时,那么,就只能像欧元区国家一样举债过日子了。

5. 加强区域金融政策的协调性。2014年7月15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5个金砖国家在上海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这有助于应对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和金融动荡冲击。“金砖银行”设立的初衷是利好的,但是,要防止出现欧债危机中欧元区没有形成财政联盟的致命缺陷(栾彦,2014; Spiegel, 2012)^[14-15]在国内,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带作为我国GDP重要贡献地区,在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出台之前也需要加强沟通协调,树立“一盘棋”思想。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好本地优势资源和中央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彼此之间的产业重复建设而造成资源浪费,避免进一步导致地区经济萎缩以及我国金融资本总量下滑的现象。

此外,还有一点应高度重视。目前各项缓解欧债危机的计划和措施只有做到“标本兼治”,才能产生效果。单纯依靠削减社会福利与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因为一贯享受高福利的国民会采取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只有从根本上对欧盟的经济结构、金融体制和政府信用等进行调整和改革(Arezki等,2011)^[16]注入经济发展的活力,并进行适度福利改革以形成“组合拳”的治理策略,国民经济才能渐渐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毋庸置疑,调整产业结构,做强实体经济,推进经济发展“新常态”,这将是近几年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理念。

参考文献:

- [1]张明,郑英,敬云川.欧债危机的现状评估、政策选择与演进前景[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3):24-38.
- [2]刘新华.欧债问题溯源:偿付危机还是丧失货币主权的危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8-24.
- [3]张晓晶,李成.欧债危机的成因、演进路径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开放导报,2010,(4):26-31.
- [4]Wallison P. J., Calomiris C. W. . The Last Trillion Dollar Commitment[R]. Financial Services Outlook-AEI Online,

September 30, 2008.

- [5] 陈志昂, 杨露, 董挺. 基于 M-F 长期债务模型的欧债主权债务危机分析——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为例[J]. 山东财经学院学报, 2011, (4): 25-29.
- [6] Grauwe P. D. . The Governance of a Fragile Eurozone[J].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2012, 45(9): 255-268.
- [7] (德) 阿尔伯特·施魏因贝格尔. 欧债危机: 一个德国视角的评估[J]. 孙彦红, 译. 欧洲研究, 2012, (3): 116-152、162.
- [8] 郑秉文. 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 (5): 2-15.
- [9] 李旭章, 龙小燕. 欧债危机: 深层原因与十大矛盾分析[J]. 经济研究参考, 2012, (40): 70-75.
- [10] 鲁全. 欧债危机是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的吗——基于福利模式与福利增长动因的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2, (3): 94-102.
- [11] Z. Nikolaos. National Fiscal Profligacy and European Institutional Adolescence: The Greek Trigger to Europe's Sovereign Debt Crisis[J].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3, 48(1): 33-54.
- [12] 王汉儒. 欧债危机爆发根源的再思考——基于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分析[J]. 当代财经, 2012, (11): 46-54.
- [13] (德) 安德雷亚斯·霍夫曼, (德) 沃尔夫冈·威瑟尔斯, (中) 夏晓文. 权力的结构性转移——欧债危机作为机制转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J]. 德国研究, 2013, (3): 4-21.
- [14] 栾彦. 欧债危机的形成机理、传导机制及防范策略研究[J]. 经济学家, 2014, (3): 84-92.
- [15] Spiegel P. . EU Hits Back at IMF Over Austerity[N]. Financial Times, 2012-11-15.
- [16] Arezki R., Candelon B., Sy A.. Sovereign Rating News and Financial Markets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R]. IMF Working Papers, 2011: 1-27.

Welfare Spending, Economic Structure and Governments' Debt Scale: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EU Studies

DAI Wei-dong¹, KONG Qing-yang²

(1.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2.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relativ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U debt crisis and its impact on the other countries, some valuable suggestions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soci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post-crisis era after the EU debt crisis and for the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 and public expenditure are two important pushers to the euro zone debt crisis, but the tax, total savings,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net export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n the government debt scale of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economic structures. As for the countries involved in debt crisis, such measures as cutting in welfare expenditures, increasing net exports, expanding domestic investments and increasing taxes are simply not effective to resolve the crisis. The most fundamental way is to adjust and reform the EU economic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system. Thes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have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new norm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 EU debt crisis; welfare spending; economic structure; governments' debt scale

责任编辑: 周全林